

doi: 10. 3969/j. issn. 1672-0598. 2009. 05. 017

清末时期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叶东,王佳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要] 清末时期,安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交通工具的变革都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徽地方政府也为发展农村社会经济,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推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如推广经济作物技术、改良农产,兴办农业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与普及农业知识,创办农政机构等,这些政策对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安徽农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引起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变革,具体表现在农产品的商品化、手工业的发展、集镇的勃兴等三个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安徽农民生活贫困,农村社会经济依然是在徘徊、反复状态下畸形的发展。

[关键词] 清末;安徽;农村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 F329. 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98(2009)05 - 0086 - 11

一、清末安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

(一)自然经济的解体

农业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特别是古代的中国,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都依赖于农业的稳定发展。安徽则是中国的重要农业区,它位于中国内地诸省的中间地带,自然条件优越,“安徽简称皖,或与古有皖国(在潜山县境)及境内有皖山(天柱山)而得名。一般习惯有‘皖南’、‘皖北’之称,皖南指长江以南,以北称皖北,惟皖北又有淮北、淮南及巢湖一带(位长江北岸)之分,有时长江以北、江淮丘陵以南又称皖中,淮南北始称皖北。”^[118]安徽有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水系之利,且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地形多样,宜于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济的发展,勤劳的安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对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安徽作为内陆省份之一,在近代前期,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还未达到安徽省境内;到了1876年中英签订了《烟台条约》,其中第

三端第一款内容记载:“由中国议准在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非为领事馆驻扎处所。……至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北之武穴、路溪口、沙市等处均系内地处所,并非通商口岸,按长江统共章程,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今议通融办法,轮船准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21349]从此洋货大量流入境内,土货通过芜湖商埠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及邻边地区。由此安徽农村经济开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安徽省内根深蒂固的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走向解体,农村的商品化程度得到了提高。

(二)对外贸易的发展

“贸易是商业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市场机能、货币流通现象,甚至民众的生活水准,因此,商贸活动可以说是观察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变迁的重要指标。”^[11456]1876年以前,安徽尚无直接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皖省“四境货物多各以其便利输入邻省,有若干部分间接转趋外洋,故在外人未入内地经商以前,即经济方面亦不与外邻发生何等关系,

* [收稿日期] 2009 - 04 - 03

[作者简介] 叶东(1984 -),男,安徽无为,人,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近现代史专业。
王佳(1984 -),女,山东济南,人,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近现代史专业。

至政治方面更无论矣。于外邦发生直接关系之始,厥为芜湖租界之辟。^{[3]1} 1876年《烟台条约》被迫开设芜湖为通商口岸,安庆、大通被列为外轮停泊处所。1877年芜湖正式设立海关,从此芜湖开始作为近代安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开始了直接与国外进行经济交往的时期。“其贸易圈主要涵盖安徽省境内的池州、宁国、太平、安庆、庐州等府,六安州、和州,以及江苏省境内的江宁府、河南省的光州亦有少许商贸货品流通。^{[1]460}兹将芜湖从开关到 19 世纪末的进出口贸易情况表示如下:

表 1:芜湖开关至 19 世纪末进出口贸易货值统计表^{[4]163} 单位:海关两

年份	洋货净进口	土货净进口	土货出口
1877	893,408	327,605	365,669
1878	1,925,075	699,456	594,945
1879	2,323,857	604,342	635,374
1880	2,374,575	544,860	1,014,709
1881	2,376,324	607,583	1,395,129
1882	1,816,695	577,669	1,313,150
1883	1,965,055	663,578	1,278,724
1884	2,088,152	593,545	1,206,793
1885	2,660,787	571,177	2,023,396
1886	3,764,837	650,874	3,574,122
1887	2,994,036	837,177	2,000,027
1888	2,655,914	916,334	1,999,903
1889	2,693,183	1,231,964	3,429,321
1890	2,922,253	1,655,452	3,051,492
1891	3,351,706	1,633,942	5,267,406
1892	3,933,092	1,746,757	5,243,390
1893	3,544,984	1,918,710	4,198,268
1894	3,416,889	1,651,561	5,156,090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芜湖海关开埠通商后,洋货涌入安徽的数量激增。从 1877 年的 89 万两增加到 1894 年的 340 多万两,增长率约为 3 倍多。二、进入安徽的土货净进口,主要是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运至芜湖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长。三、安徽对外出口的土货数量由 1877 年的 365,669 万两增加到 1894 年的 5,156,090 万两,增长率约为 9.5 倍。芜湖开埠通商后,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芜湖开埠通商,开启了芜湖和安徽地区对外接触的窗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在安徽推销机制品和收购农副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芜湖对外贸易的发展。

其次安徽襟江带淮,地博物丰,淮河流域盛产

旱粮作物,长江两岸和巢湖周围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盛产水稻。皖西、皖南山区历来为重要的林茶生产基地。这些丰富的资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觊觎的对象。

再次,芜湖作为长江中下游口岸城市之一,其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它上承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的货物,下接江、浙等省的物流,使芜湖发挥着长江流域商品流通中的中介口岸城市作用。

总之,芜湖作为近代安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城市,为安徽自然经济的分解、商品经济的活跃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 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

皖省原有的交通工具,陆路交通向来以车马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以陆地驿站为最便捷的陆路交通组织;水上交通则以帆船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以官家漕船为仅有的帆船组织;依据这种传统的交通工具的结果是:“日行不及百里,书报之传达不易也,而新闻绝少;教育之聊助不广也,而学识孤陋;货物之输运不便也,出者停滞,入者价贵;巨商大贾之聚集不多也,无资以兴办大工厂大矿区。^{[1]309-310}进入近代以后,蒸汽动力和其他动力的新式交通工具如铁路、轮船开始在皖省发展起来。新式交通工具在皖省的运用,沟通了皖省内地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打破了皖省各个区域隔绝的状态和外部世界信息的进入,使得皖省许多过去无法出口的农产品成为出口的货物,改变了农产品出口结构。皖省长江一段水运以行驶海轮(大型汽船),较大河流则以行驶小汽船,配合原已行驶的各河民船,担任交通运输上的主要角色。陆路以铁路运输为主要交通工具,清末民初时期,安徽地区的铁路建设,在中央所议及主持的有津浦路南段、浦信路(江苏浦口至河南信阳,大部分路线在皖北境内)、宁湘路(南京至萍乡或长沙),其中 1908 年至 1909 年,英国人开始承修津浦铁路,随后在这里架设淮河铁桥,1910 年,津浦铁路正式建成通车。并在蚌埠设站,与淮河航运,共同构成了水陆交通中心,成为皖北、皖西及豫东南等广大地区的货物集散地。这样近代安徽便形成了发达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

二、清末安徽政府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政策措施

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安徽的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战争波及的广大地区,田亩册籍大多失散,土地更废无常。清政府如果继续在皖省采用

横征暴敛的手段进行搜刮,势必愈发丧失民心,甚至扩大太平天国的群众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政府从长远的统治利益出发,不能不对田赋制度进行清理和整顿,以求维护自身的统治。1861年9月,清军攻陷省城安庆,曾国藩即在省城设立“善后总局”,开始清查和开征田赋。因为战争的破坏非常严重,清赋工作十分困难,一直到1864年,才得以实行减赋。其主要内容是:“漕米每石除部定一两三钱外,另加一两二钱,作为司库提存之款;废止陋规捐摊之费,另加一定数额的“丁漕余资”,以为州县办公之用。漕粮银两折征钱文数额,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而定,每石从4000余文至6500文不等。安徽省核减的浮收总数,大约为一百二三十万千文。”^{[5]1662}安徽省的清赋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方面它缓和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保证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为战后安徽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使安徽农村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发展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经过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为了制止田地失额,皖省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复业垦荒的措施,以图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增加地丁钱粮的收入。同治初年,在皖北与皖南分别颁布了“安徽省兴办屯垦告示”^{[6]848-850}和“皖省开垦荒田章程”^{[7]123},皖北规定:“在临淮设屯垦总局,凤阳、定远各设分局,由委员会同地方官共同经营。佃户领田、领牛、领种均由局绅承保。”同时皖南也“成立农本局专办垦务,局务由官绅共理。”并且,“承认原有地权;对无业主有佃户者,佃户可具结暂垦,业主佃户并无入者,由官募佃垦种。可见,清政府鼓励垦务政策的主旨之一,就是力图清理原有产权,恢复和保护原有田主的利益,很明显这是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实施的。而另一方面,政府在不损害固有的统治基础的情况下,重新建立和调整土地关系,“开垦荒田,由地方官勘明后,根据来领者人力之多寡,给予田、牛、种,每领牛一头,折付农具钱三千文;牛归各佃自行收养三年,缴价后,听其自便,“散发牛本籽种,牛按原价的20%分3年还本,籽种秋后即还,无利息。”“初行开垦,需工必多,自应酌量收粮,以纾民力。当秋成后,以中熟为率,岁收一定,各亩皆同,第一年官收田租十分之三,第二年十分之四,第三年田已成熟,即行平分。倘遇水旱灾害,则酌量减收。扩大小农人数,增加国家的赋税,“难民还乡认田者,有印契可凭,或是有邻右可据,即将附近荒田如数拨给,一体借给牛

种,分年缴还,完纳正赋;”“本地灾祸连年,地广人稀,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的保,准其开垦,其缴价收租,与土著相同。”由此缓解了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扩大了政府统治基础。当然,这不仅是反映封建政权与豪强地主阶层之间的矛盾,也说明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

战争的破坏也使得清末安徽农村人口大幅度的下降。在地广人稀的州县,清政府则实行招徕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即荒田荒地由政府 and 地主招佃垦种。于是大量的安徽邻近各省农民,迁到安徽,佃种荒地。这些迁往安徽各地的客民在这一时期迅猛增长,其中皖南地区最突出,在广德建平等处“当道出示招徕,客民之开垦而来者四方响应。”^[8]客民开垦荒地,为恢复安徽农业生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滁州“大乱之后,土著十不存三四,大率光州、安庆之人挈室而来,开垦荒土。赋额渐复,客民之力。”^{[9]11}通过垦荒,许多客民变成了自耕农,造成了清末安徽地区曾一度出现自耕农陡增的现象。

在具体扶植农业发展的行动中,安徽地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新举措。

(一)推广经济作物技术、改良农产品

1. 提倡蚕桑及湖桑的传播

晚清以前,安徽的植桑面积不大,蚕茧产量也不高,制丝方法落后,品质也欠佳。安徽怀宁“桑多野生,昔年蚕缲之事,百家一二。清光绪间,省长官创设桑园,由江浙运桑秧栽于城之东郊,使人习养蚕缲丝诸法,并迭经出示劝导,风气渐开。邑人仿而载者,如白麟坂、戴家店、江家嘴等处,不下数十家,得丝数百两或百余两不等。”^{[6]884}“安庆素不知蚕桑之利。往岁彭大令赴湖州购买桑秧数万株,合众集股,设课桑园于无里庙之东偏,又雇熟于植桑者栽培浇灌。现已成林,各处乡民颇知观感。”^[10]芜湖在光绪23年设课桑局,“由道宪袁观察委派饶翼卿守戎、刘仲爽参军、总理其事,并于河南岸南寺沟、北岸枣树园两处空隙之地,多种桑条,以便农民来局领种,实为兴利要务,闾阎莫不称便。今年皖南各属来芜领种者,实繁有徒。饶守戎以枣树园一带隙地仍多,虽有贫民搭盖草屋,类皆无主者多,守戎乃善为劝导,给移居费,……以便多辟地段,推广种桑。”^[11]

2. 推广外国农产品的输入

据1907年日本外务省的《清国事情》记载“江苏省西北部山岳相连的地方,和安徽省南部与浙江省交界的地方,种植旱稻者颇多。像本年这样雨量

过多江水泛滥的年份,水稻大多被水淹没,毫无收获。而上述山地的旱稻,反而异常丰饶。芜湖农务局已有鉴于此,四年前曾恳托本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分馆)输入日本旱稻种子名“女郎”者,从事试种。试种结果,日本种比本地旧种耐旱,稻秧发育充足,枯穗较少,以此获得赞许。据说现在当地所种的都是这种旱稻。^{[6]897}

可见,清末安徽地方政府在农村推广经济作物技术和改良农产品方面,促进了安徽农村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及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兴办农业学堂、发展农业教育

近代皖省农业与传统农业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生产中对科学技术及某些非传统的生产要素的应用。当时皖省农民“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12]4758}，“乡民农务,而不知农之有学。其于辨土性、兴水利、除虫害、制肥料等事,懵然不知。古法相传,日就湮没。”^{[6]580}因此,有必要培养皖省农民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1901年8月,晚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兴办学堂,指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诏书中说:“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3]

安徽地方政府为了从根本上振兴农业,通过兴办农业学堂、发展农业教育来培养农民的科学知识,从而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引导农业生产。在几年内,安徽兴办了一批新式农业学堂,“和州属含山县,万方卿大令刻筹款在邑中创一斌农高等小学堂,延日人某君充农学专科教习。”^{[14]145}“怀宁,方绅元衡等拟于省城育婴堂改设植婴启化学堂,教育本堂婴孩男子教以识字、算数、习艺、学医,女子教以树育蚕桑纺纱织布。”^{[15]26}“颍州程绅恩培前于郡城端化义塾创办蚕桑学颇著成效近已禀明提学司改为中等农桑实业学堂遵照钦定学堂章程切实办理。”^{[16]170}

“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安徽省前后共办有高等学堂10所(综合性1所,师范2所,政治3所,军警2所,工业1所,农业1所)。全省办有实业学堂14所,其中高等实业学堂2所,中等实业学堂1所,初等实业学堂11所。”^{[17]20}这些新式农业学堂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礼义纲常的儒家思想教育和科举服务为其唯一宗旨的传统教育,为近代皖省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新式农业科技人才,传播了近代农学知识,给传统的安徽小农社会注入了新科

学的活力,对近代安徽农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对皖省近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创办农政机构,发展农业生产

安徽地方政府通过农业教育,推广农业技术、鼓励组建垦殖公司等措施支持农业的发展,使安徽农业逐步趋向近代化。如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近代农业垦殖公司首先在皖省发展起来。1899年十二月九日《汇报》报道:“安徽万方卿大令,奉委集股创设开垦公司,有章程一条,购买荒田,耕桑之外,兼种竹、木、棉麻。大令又与芜湖商局提调刘大令会商,合力举办。闻所购田地约三千余顷。”其后较有影响的有东流安阜垦务公司,贵池垦务公司等。这些垦务公司大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新式农业机械,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出售商品,牟取利润为生产目的,他们的投资和集股方式都是资本主义化的,与那些只讲求自给自足、把剩余产品投入市场的封建地主以及为维持生活不得不出卖粮食等经济作物必需品的个体农民的经营目的截然不同。这些近代早期农垦公司的存在,标志着安徽农业资本主义的起步和发展。此外,安徽先后设置了一系列的农政机构,专门负责指导和管理全省各地的农业生产,为农业提供服务。“徽州府黄太守于癸卯年创设农工商务局于府城”^{[18]155},1906年,安徽又遵照中央旨意设立了垦牧树艺总局,是皖省最早出现的农林事业督导提倡机构。随后,清朝农工商部奏准颁行《农会简明章程》,规定各省设立农务总会及分会、农工实验场,以提倡农业。皖抚照例是飭令所属“实力照办”^[19]。清末农会的宗旨为“开通农民知识,因地制宜,改良种植,一切冀农业之发达。”^{[20]11249}自此,农会、农工实验场开始在安徽创办。宣统元年10月23日全皖农务总会成立,选余诚格、李国楷为总理、协理。^[21]“宣统二年,省城安庆设立农事实验场,是为皖省政府设立农业改良实验机构之始。”^{[11]330}“芜湖在宣统三年成立农会”^{[11]322},这些管理农业机构对于启迪农智,倡导农学、宣传政府农政,无疑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清末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

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安徽地方政府发展农村经济政策的推行,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了部分变革。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具体表现在农产品的商品化、手工业

的发展、集镇的勃兴三个方面。

(一) 农产品的商品化

从经济史角度来看,农产品的商品化主要是由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尤其是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造成的。马克思说:“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市

场。”^{[22][1718]}而这种分工和分离,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增长为前提,分工和分离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清末安徽农村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加快来看,农产品商品化不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增进,而主要是由对外贸易引起的。下表就是几种发展较快的农产品输出统计的有关情况:

表 2: 1886—1911 年芜湖海关主要农产品出口数量统计表^[23] 290-291-294-295-296-297-298-300-301

年代	稻谷		小麦		豆类		丝	
	数量(担)	价值(两)	数量(担)	价值(两)	数量(担)	价值(两)	数量(担)	价值(两)
1886	2,325,841	2,732,517	2,617		36,096	39,832	69	11,900
1887	1,055,822	1,132,670	132	109	18,574	20,442	268	48214
1888	947,341	931,622	25258	20,944	80,666	94,938	274	48,677
1889	2,117,098	2,274,214	40,400	32,411	36,959	37,533		
1890	1,518,545	1,721,526	26,221	24,057	18,365			
1891	3,385,989	3,900,555	16,304		52,360	56,458		
1892	3,159,763	3,704,511	55,416	50,269	27,969			
1893	2,091,019	2,574,877	59,134	56,128	58,061	68,524		
1894	3,402,873	3,620,360	38,025	30,127	29,688	36,570		
1895	806,176	1,027,444	3,451		48,593	61,214		
1896	3,132,734	4,747,768	95,311	119,618	40,489	59,008		
1897	1,521,912	2,221,083	112,332	167,574	3,195		1,329	248,279
1898	1,654,714	3,019,124	11,340		59,500	108,725	788	206,844
1899	4,922,746	8,779,846	122,965	197,681	84,479	182,419	1,795	460,790
1900	4,970,810	8,022,238	170,777	266,025	157,688		996	285,088
1901	2,324,424	3,689,394	139,981	204,567	73,932		1,392	326,841
1902	4,302,049	9,065,671	324,416	557,145	25,570			159,545
1903	5,720,256	11,372,462	139,416	231,991	110,544		1,277	173,699
1904	5,621,143	11,203,477	102,101	204,202	150,204		993	426,900
1905	8,138,093	19,313,942	131,197	314,871	119,841	232,542	732	313,869
1906	4,994,135	11,285,434	20,388	44,854	21,560	51,746	611	250,625
1907	2,452,180	7,290,398	32,424	81,059	28,335	70,773	1595	642,934
1908	4,825,753	12,947,548	7,647	20,646	29,490	67,652	1802	670,284
1909	4,944,923	12,743,087	112,467		68,046	169277	1,421	501,691
1910	3,582,478	11,563,454	63,073	162,004	23,095	68,813	1,070	414,253
1911	2,665,151	8,652,544	38,523	113,258	24,837	70,789	1,277	522,081

注:表中稻米数据由芜湖海关历年关册、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安徽省志》、《海关十年报告》、《中国建设》第 11 卷 4 期、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第四章(稿本)等有关资料编制。另外,表中小麦、豆类、丝数据由芜湖海关历年关册、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第四章(稿本)等有关资料编制。

由上表可知,芜湖开埠以后,粮食作物的农产品出口数量迅速增长,其中稻谷成为皖省主要粮食作物的出口商品,1905 年出口数量达到了 800 多万担,价值 1900 多万两,占整个出口土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居各类出口土货总值第一;小麦、豆类、丝出口数量和价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大量的农产品出售也为皖省农村增加了商业资本,

随着赋税缴纳的货币化,农家不得不靠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来获取货币去交纳田赋、地租及购买部分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情况下,安徽农村经济开始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农产品开始商品化的发展,使得农民充分认识到谁能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产品,谁就能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

清末安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不仅表现在农产

品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而且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愈来愈趋向专业化和区域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原料的生产基地,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棉花出口价格得到了提高,棉花出口数量激增。这就大大促进了安徽商品性植棉业的发展。“安徽产棉区域,以宁国、定远、涡阳、和州等处为最,岁收或三千余石,或四十余万斤不等;英山全椒、怀宁、望江、东流、贵池次之,太湖、太和、建德、繁昌又次之。”^{[6]421}其中在1910年,“安徽宁国、定远、涡阳、和州棉花年产量都在3,000石,系每一州县产额,合40余万斤。”^{[6]418}这些都说明了安徽棉花的种植,主要是服从于国际市场发展的需要。至于桑的种植,这时,在安徽某些地区也已经作为商品性农作物来经营。其中滁洲“向无蚕事,乱后养蚕颇多,每年可出茧四千斤。”^{[6]429}全椒县“西北乡所在多有,野生者曰花桑,多葇。近二十年,往往辟良畴接湖桑,城市亦多植之,蚕桑之利渐广。”^{[6]429}而这一时期,有些地区不仅普遍栽植蚕桑,连桑叶也作为商品交换了。“青阳县所属,缲出蚕丝大约有七八分收成,幸地方上蚕少叶多,购叶之家至贵时每叶百斤值本洋六角余,价贱时每本洋可购叶五百斤,甚有满园绿冶而无人过问者。”^{[6]429}可以说,这时期的蚕茧成了安徽长江流域一带农民副业的重要收入之一。此外,茶叶作为皖省出产之大宗,也很快作为经济作物来种植。皖南“建德为产茶之区,绿叶青芽,茗香遍地”^{[6]450}。安徽祁门红茶,19世纪70年代创制成功,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秋浦、至德等地遂使成为红茶产区。皖南、皖西的农户大部分毁田改种茶树,茶园面积不断扩大。安徽烟草业的发展,以“宿松、桐城、凤阳,产烟最旺。宿松种烟,始于清咸丰时,盛于光宣间,年产约三万余担。桐城年产约二万余担,以东乡周家钱瞳家铺等处所产最优。凤阳产烟,不亚桐宿。”^{[6]442}由于烟叶的获利额高,刺激了农民种植烟叶的积极性,在五河县“烟叶……近时种之者多,而获利亦可补谷之不足。”^{[6]442}怀宁县“烟叶处处可种,而能使地瘠,老农每岁易其种之处。昔年自独秀山至东西冶塘、江镇所产尤多,惟香炉冲、蔡家坂最良。……其值视他产为高,农民一亩烟之获利,厚于一亩田。”^{[6]442}其他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或多或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鸦片这种毒品的广泛种植却没有任何意义,它是西方列强为毒害中国人民而引进种植的商品作物。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取

得了合法地位,清政府为抵制“洋药”,同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转而鼓励种植罂粟,“在安徽省,凤阳府、颍州府、及徽州府所产,每年约达四五万担”^{[6]460},全椒县“各处多种鸦片,原隰龙鳞,弥望皆罂粟花,嫣红夺目。小户人家均种一二亩二三亩不等,咸谓利多于禾。”^{[6]460}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不断扩大,增加了对商品粮食的需要,因而促进了粮食商品化的发展。其中全椒县“出口货以粮食为大宗,以中稔年计之,至少约十余万石。”^{[6]470}“上游聚粮之地,首在庐州府属之三河、运漕两处,不特一府之米会集于此,即河南光固等处产米亦皆转运而来。每处每年出粮不下数百万石。其次则太平府属之官圩,宁国府属之湾沚镇;又次则安庆府属之中央镇,皆系聚米之地。”^{[6]470}

总之,清末安徽农产品的商品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清末安徽农业生产结构开始随市场关系的发展而变化。在封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结构的形成,是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于各种农产品的需要量来决定的。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清末安徽农业生产结构日益体现出市场力量对它的影响。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不断增加。其次,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在清末安徽农业生产中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化的区域。农业中各种作物种植的地域化和专业化,在安徽虽然早已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在农村经济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下,这种地域化和专业化只表现为对自然气候等地理条件的依赖性和消费习惯的世袭性。其发展是沉滞和缓慢的。而清末安徽农业自被卷入国际市场之后,以商品经济性质而推动的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地域布局,则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和发展。再次,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更加剧了清末安徽农民经济的分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许多生产条件不同的小生产者,因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加剧分化。一些经营条件比较好的生产者,由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竞争中就会占上风,就会因获利而发财致富;而另一些经营条件较差的生产者,因为商品的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贫困破产。农民经济中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造成了清末安徽农村农民破产化的严重局面。

(二)手工业的发展

1.手工业发展的概况及原因

进入近代,随着商业性农作物栽培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安徽农村手工业的发展。

并发生了如下一些变化:首先,部分传统的手工业被大量进口的外国制品所代替。手工纺纱原属于安徽农民家庭手工业,纺纱织布成为广大农民的主要副业之一。“皖之女红,多精纺织”^{[24]15},便充分展现了皖省广大农民以织助耕的自给自足生活。随着芜湖对外通商,大量洋纱洋布倾销到了安徽市场。由于洋纱洋布系机器产品,进口中国税率又极低,因此其价格比中国土纱布便宜,造成了土纱布销路日渐减少。1899年,芜湖海关统计,洋纱进口6.8万担,洋布进口51.4万匹,二者占是年洋货进口货值的4/10。^[25]“中华专用洋纱,或搀用土纱,织成布匹,均属销售合宜,殆只敌外洋下等粗布耳。”^{[26]1217}皖西的《霍山县志》记载:“咸、同以前,乡民多有制机织布者”,自洋布涌入皖西以后,许多“名家机布,今已无传”。^{[27]1122}虽然洋纱洋布的输入冲击了安徽传统的纺织业。但我们对皖省手工纺织业破坏的程度也应作恰如其分的估计:第一,由于传统的习俗,使织布事业能在乡村里继续存在着。这是因为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观念在皖省农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农事是季节性的,秋季收成后,农民有着长期的时间休闲。农家织布便是农隙工业之一。第三,皖省多山区,因为交通不便,洋纱洋布不能畅达腹地,土布便成为专利市场。第四,由于消费者的习惯需要,也能保持一部分土布的销路。广大农民对于土布的坚实耐用,还是比较赏识的,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老实朴素的百姓喜欢穿这种坚实的土布。因此,尽管洋纱、洋布物美价廉,但是广大农民仍然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洋纱洋布,继续从事耕与织相结合的劳动生活。其次,大部分传统手工业随着安徽农业商品化和外贸的需求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滁州、安庆等处,大多数农民纷纷到外地购买桑秧,引进桑蚕,致使养蚕、缫丝风气渐开。据光绪《婺源县志》记载:“纺织之利,郡守何公倡于曩昔矣。乃三四十年,来,村氓多逐于植茶,今岁壬午(1882年)爵阁督部堂左公(宗棠)从潘太守纪恩之请,捐廉市嘉兴桑秧十万株,运解婺源种植。将来满道成荫,蚕事之兴,必有与棉花并行不悖者。”^{[26]115}同时,皖省手工制茶业也随着外销茶叶的猛增,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安徽“屯溪镇上较大规模的茶号就有百余家,茶号工人分为筛工、炒工、拣工三种,每年茶市,各地来屯溪受雇于茶号的工人多达1.5万余人。”^{[28]1200}为了防止制就之茶受潮,需要对茶叶进行包装后,运往外地。安徽制茶的锡罐业、茶箱业

以及箴箱业也相应得到了发展。在屯溪,“茶叶外销鼎盛时,镇上设有锡罐业9家,熔炉工人超过200人,每年制锡罐25万只以上;镇上设有箱栈17家之多,每年制木箱10万只以上;镇上设有箴箱业10余家,工人有200多人。”^{[29]1201}安徽手工制茶欣欣向荣,还表现在:皖南祁门红茶的创制,据史料记载:“安徽改制红茶,权舆于祁建,而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之贵溪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元二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30]19}再次,洋货中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输入内地后,一些手工业者开始仿制起来,逐步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向近代工业过渡。新兴的肥皂手工场在沿江一带的出现就是一例。如“安庆张某纠集股本,在皖垣西门外四眼井地方,租定房屋基地,开设裕昌肥皂公司,已于三月下旬开厂。”^{[26]1337}此外,安徽近代手工业中的传统行业如宣纸、徽墨、宣笔等。由于是安徽的土特产,且历史悠久,制工考究、工艺精细,与安徽特殊的经济和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因此在清末得以继续发展。

前述清末安徽农村手工业在西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在生产规模和销售范围上都比前代有所发展。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原因。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是以沿海、河湖口岸地区为重心的,特别是他们以商业资本输出为主要方式的时候,沿海、河湖地区更为便利。安徽系内陆省份,风气开化较迟,受西方列强的经济浸透亦相对迟缓。虽然芜湖开埠后,棉纺织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但洋纱的大量进口为手工织布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刺激着安徽织布业的发展,这就为手工业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安徽各地日用手工业的生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其二,随着农业的商品化,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清末时期,芜湖成为全国的四大米市之一,每年都有许多谷米出口省外,与米业有关的手工业相应得到了发展。如碾米业、斛行业在安徽各地应运而生。另外,茶叶、花生等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也促进了制茶、榨油业等手工业的发展。最后,对一些出口产品进行初级加工而形成了一些特殊手工业部门。清末时期,安徽对外出口产品中较大宗的有蚕桑、茶叶、烟叶等。对这些商品必须进行简单的处理或初级加工,于是在各地就

出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如:锡罐业、茶箱业等手工业作坊。

2 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多元化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芜湖的对外开埠通商,安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逐渐发展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安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安徽农村手工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与封建社会时期所面临的环境是不同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和国内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的大环境下,安徽农村手工业的经营方式产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四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局面。

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最古老的组成部分。这种家庭手工业所需资本不多,工艺技术比较简单,最大的特点是满足家庭消费。清末时期,安徽农村的这种家庭手工业虽然在逐步分解,但仍然普遍存在安徽广大农村地域之中,并占有很大比重。以棉纺织业为例,安徽农村大多数农家都有纺车、织机,各家妇女都在家里自纺、自织。这种自给自足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是近代安徽最普遍、最典型的存在手工业经营方式。

以交换为主的家庭手工业:这种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是清末安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性分工。这种社会分工,主要是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而不是供给自己使用。但是由于安徽的地理环境比较复杂,南部多山区,所以导致了安徽农村这种家庭手工业在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专以手工业为主,且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有的虽然以农业生产为生,手工业只是农闲时的副业,但产品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供市场出售,获取货币。如安徽怀宁县“皖之女红,多精纺绩,虽浴种采纂,比户不废,而所重惟布。木棉之出,盛于望,聚于石碑,流于江镇,高河铺。大率四斤木棉,可取一斤花,三斤花可纺一匹布。布有美恶不等。”^{[6]1505}从生产关系上来看,这种家庭手工业方式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一家一户不仅拥有生产原料、生产工具、制成品的所有权,还兼有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双重角色。每家每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没有任何形式的雇佣关系。所以这种生产方式依然是小商品生产范畴。

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家庭手工业:在这种家庭手工业的经济中,手工业者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形式

而存在。农民依靠自己的原料设备,在家中生产手工业产品,再把产品卖给包买商,换取现金。如安徽屯溪“此地有若干大茶商向茶农及寺院收购茶叶,并加以精致和分类,标以庄号,运至上海或广州销给洋商。”^{[31]1532}也有商人也供给农民原料,但让农民在家中生产产品,然后收回产品,再发给他们加工的工钱。由此可见,这种商业资本不仅支配了手工业生产的交换过程,而且有时还控制了手工业的生产过程。商业资本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也经远离了自然经济的范畴,成为剥削劳动的资本家。

手工工场手工业或小作坊手工业:随着国外科学技术的传入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实践,推动了安徽农村手工业生产向近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转变。与前几种经营方式相比,这种手工工场有较为固定的制造场所,并使用家庭成员以外的劳动力进行手工生产。可以说它是商业资本已经转化为产业资本后出现的产业经营方式。如安徽芜湖的箔坊“纸业,同治间仅有十二家,货源大都来自江西及吴城镇。光绪初,渐有起色,共有纸号十六家,每年营业约二十余万,始设箔坊一家,嗣于河南增设一家,常川能容箔工二百七十人,为全皖之冠。”^{[26]123}我们从规模上来分析,这种工场充其量也只是个小手工工场。而从生产关系来看,小手工工场主已经发展成为靠剥削雇工劳动而生活的资本家,雇员则是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当然,由于规模小,雇工不是很多,有些小场主还亲自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这反映了安徽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因素尚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安徽手工业中的小场主没有在这条道路上上升为资本主义的大场主,成为大资本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安徽农村手工业发展已经产生了多元化途径,起着拾遗补缺的功能。

由前述四种类型来看,清末安徽农村手工业已经具备相当一部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商品性质生产,这与自给自足的经济时代手工业是不同的。安徽农村这种新的生产力出现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型,给安徽农村经济的传统格局和固有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标志着旧生产方式的没落和新生产方式的崛起,同时,它又是一个传统行业的延续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就在新的生产方式要从各个方面改造、提高、排斥和淘汰旧的生产方式的时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新旧生产方式的共生、并存与互补,

有时甚至是“双赢”。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的诞生、成长、成熟和蜕变过程,都离不开纵向的继承和横向的渗透。从纵向来看,一个新的生产力发展必须以旧的生产力为基础,具有纵向继承性,它弥补了旧生产力的不足;从横向来看,新的生产力在开放的状态下都会受到旧的生产力的影响,具有横向的吸附性和流动性,它是高级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因此,新生产力与原有的旧社会生产力交错共存,对社会再生产的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清末安徽手工业的发展演化中,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使得农民的生活与生产能够勉强维持下去。

3.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

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清末安徽手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不是很快,大部分产品只在国内甚至省内销售。清末安徽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新的经营方式的出现,对缓解农村劳动力的隐性失业,增加家庭收入以及调整对安徽农村经济结构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清末安徽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一,安徽农村家庭手工业消化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是季节性的生产,农闲时存在人力浪费,再加上农地狭小不足以维生。家庭手工业不仅弥补了农民家庭生活的不足,还可以增加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总量,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第二,扩大了商品流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的带动下,农民生产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出卖,为了获利。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加强了,农村市场的商品数量繁多,扩大了商品流通,使处于极端贫穷状况的农民增加了一条最合理的创收门路。清末安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弥补了农民家庭的开支不足,对农村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第三,在传统安徽农村经济结构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传统安徽农村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主、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

然经济。农民既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手工业品,产品基本上不与市场发生联系。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芜湖的对外通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分开始逐步深入皖省,皖省被逐渐融入国际市场之中。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安徽农村手工业由小规模自给性生产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商品性生产,农村经济结构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地看出,清末安徽农村手工业,在特定时期内,不仅具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而且也具有发展商品生产,促进安徽农村经济发展等有明显的积极性。

(三) 集镇的勃兴

综观近代安徽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它基本上是从当地现有资源出发,有什么原料就生产什么产品,生产什么产品就到集镇市场上销售什么。集镇作为“乡民聚集贸易之所”成为安徽农村地区经济发达的象征和衡量商品化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大农民肩挑手提,趋市赶集,为买而卖,交换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从而维持小生产的正常进行,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安徽农村社会传统产业的发展,农村市场商品交易量不断的增加。使集镇的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除满足小生产者的基本需求外,还成为集散物资、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作用。安徽逐渐形成了以新安江流域、皖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三大贸易区域。通过这些贸易区域的集镇,皖省农产品辗转运销全国各地,造成了皖省集镇的勃兴。如合肥的三河镇为“水陆通衢,万商云集”^{[32][140]}，“建德县城南三里有尧渡镇,为商贾辐辏之区,向来典铺鼎峙,乡民赖以挹注。”^[33]但是这些集镇商业繁荣的表象背后是农民为了维持生活必须出售多种农副产品和劳力的历史真相。众多农民的贫困和艰辛换来了商品性农业和各种工副业的发展。随着安徽农村商品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到了晚清时期,安徽省的集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也不断在扩大,它们已经成为一方商贾辐聚之地。如下表:

表 3:明清时期安徽各地市镇发展状况^{[34][100]}

地区	明代及清前期			晚清时期		
	州县数	市镇数	平均每州县市镇数	州县数	市镇数	平均每州县市镇数
安徽	31	708	22.8	23	671	29.2

从以上图表可知,明代及前清时期,安徽省的州县数是 31 个,市镇数是 708 个,平均每州县市镇数仅有 22.8 个;可是到了晚清时期,皖省的州县数为 23 个,比明代及前清少了 8 个,市镇数为 671 个,比明代及前清少了 37 个,平均每州县市镇数为 29.2 个,比明代及前清增长了约 7 个。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近代安徽传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近代工业产品在集镇市场上交错杂陈,商业兴盛,涌现了许多店铺、行栈,大大小小的“行商座贾”如雨后春笋般活跃起来,交流货物,调剂有无,促进了广大城乡商品的交换,推动了安徽各地农村集镇的发展。其二,晚清时期安徽集镇之所以增长如此之快,是因为这期间皖省交通工具得到改善,水陆交通便利。商人通过铁路、轮船来贩运农产品或手工业品,大大缩短了内地农村到通商口岸的运输距离和时间,降低了运输费用,使一些容易腐蚀破损的农产品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同时大量工业产品,通过西式交通工具,进入皖省内地,使得皖省集镇很快地发展起来。

总之,近代安徽集镇的兴起是安徽农村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果,对于清末安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持续的发展是以小农经营为基础,以集镇贸易和地方市场为主要渠道,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造成了农产品出售机会及价格等各方面的不利条件。

总结

进入近代的安徽,以江、淮为界,逐步形成淮北、皖中和皖南三大块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同时地处华东腹地,靠近沿海,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略与冲击,这种侵略和冲击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是促使安徽农村经济发展的外源因素;而清末安徽地方政府对皖省农村经济的政策是安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在外源因素和内部动力的相互作用下,安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明显的变更。

安徽农产品的商品化、手工业的发展、集镇业的勃兴,一方面反映了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开始部分地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结构变革;另一方面则说明清末安徽地方政府为发展皖省农村经济的政策已经在实际执行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安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使原来的自给性农业、农村副业、农民家庭手工业向着生产全面商品化方向发展。农民的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仍不过是一个使用价值生产者的行为,其生产耗费与保障家庭人口的生存相适应,农业生产主要还是为了追求生存的最大化,没有发展成为追求社会化大生产。农民依然贫困,农村社会中缺少大量的货币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条件,无法建立起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内市场。

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维持广大农村的稳定安全是第一要义。所以,清末安徽地方政府所推行的种种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政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需要的政治产物,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清末安徽农村经济最终没有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加以频繁的动乱和自然灾害的严重摧残,决定了清末安徽农村经济社会是在徘徊、反复状态下畸形发展的。

参考文献

- [1] 谢国兴.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 [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6月.
- [2]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2.
- [3] 安徽通志馆编印. 安徽通志稿·外交考 [M]. 绪言.
- [4] 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 郑学檬. 中国赋役制度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6] 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一辑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
- [7]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Z]. 卷 11.
- [8] 《益闻录》845号,光绪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Z].
- [9] 熊祖诒等. 滁州志·风俗.(卷二之一) (Z).
- [10] 农学报 [N]. 第五十六期,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中.
- [11] 农学报 [N]. 第三十三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下.
- [12]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卷 4) [M]. 北京:中华书局.
- [13] 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六九).
- [14] 东方杂志 [J]. 第一年,第六期,教育.
- [15] 东方杂志 [J]. 第三年,第一期,教育.
- [16] 东方杂志 [J]. 第四年,第七期,教育.
- [17] 王世杰主编. 安徽省教育大事记:1896—1995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 [18] 东方杂志 [J]. 第一年,第五期,实业.
- [19] 商务官报 [J]. 第五期,光绪 34 年 3 月 5 日.
- [20] 清朝续文献通考 [M]. 第 378 卷,“实业 1”.
- [21] 申报 [J]. 宣统元年 10 月 29 日.
- [22] 马克思. 资本论 [M]. 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

- 社, 1975.
- [23] 王鹤鸣、施立业. 安徽近代经济轨迹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 [24] 怀宁县志 [Z]. (民国 5 年) 卷 6
- [25] 江南商务报 [J]. 第 23 期.
- [26] 彭泽益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 - 1949) 第二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1962.
- [27] 光绪 31 年《霍山县志》卷二 [A]. 自程必定主编. 安徽近代经济史 [M]. 合肥: 黄山书社出版, 1989.
- [28] 中国经济志·安徽休宁县, 第 31 页 [A]. 王鹤鸣, 施立业. 安徽近代经济轨迹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 [29] 中国经济志·安徽休宁县, 第 43 页 [A]. 王鹤鸣, 施立业. 安徽近代经济轨迹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 [30] 农商公报 [Z]. 第 20 期, 政事, 1916-3-1.
- [31] R. Fortune: A Journey to Tea Countries of China, p. 83 - 84 [A].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M]. 第 3 册
- [32] 王济生、毛玉发. 古镇三河·三河航运史 [M]. 政协皖西文史委员会, 1985.
- [33] 益闻录 [Z]. 156 号, 光绪八年四月初八日
- [34] 任放.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杨 睿)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in rural areas in Anhui in late Qing Dynasty

YE Dong, WANG Jia

(Sociology Colleg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nhui Wuhu 241003,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atural economy of Anhui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as well as changes in transport is to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Anhui local government as well 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to varying degrees, has made its own efforts,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develop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promotion of cash crops such as technology,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gricultural schools,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knowledge,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such as agriculture, these policies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f Anhui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With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the Anhui rural economy,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led to some changes, specifically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in three aspec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ndicrafts development, market town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Anhui peasants live in poverty, the rural economy is still around and repe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state of deformity.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hui; society and economy in rural areas;